

學坦
者蕩
情人
懷生

王賡武

訪談與言論集



主編：劉宏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學 坦
者 蕩
情 人
懷 生

王賡武

訪 談 與 言 論 集

主編：劉 宏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坦蕩人生 學者情懷
王賡武訪談與言論集

作 者 王賡武

出 版 者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

印 刷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S) Pte. Ltd.

初 版 2000年9月

國際書號 ISBN 1-879771-43-8 (pbk)

版權所有 ©2000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編者的話

劉 宏

記得第一次見到王賡武教授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當時他帶領一個澳洲學者考察團到中國瞭解東南亞研究的狀況。筆者那時正在廈門大學學習印尼歷史與政治，在聽了王教授的演講後向他請教一些問題。他除了耐心地回答我的提問之外，還鼓勵我學習印尼文，以便更深入地瞭解馬來世界的歷史與文化。此後，筆者到歐美進修並攻讀博士學位，經常有機會接觸王教授有關東南亞歷史、中國—東南亞關係以及海外華人等方面的深具啓發性的論著；它們對我在學術上的成長起了莫大的指導作用。

因此，當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及八方文化企業公司主席潘國駒教授邀請我參與選編王教授的兩本文集的工作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它不僅能使自己重溫王教授學術上的獨到見解，而且有助於更多讀者瞭解一個蜚聲國際的海外華人學者的成長道路、心路歷程和時代環境。

本文集共選編了三方面的資料。(一)王賡武教授所接受的訪談錄和有關他的特寫，其內容包括他本人的家庭、個人經歷、治學道路、出掌香港大學校長的經歷與感受等。(二)王賡武教授在一些學術和社會活動中所發表的公開演講，它們涉及中國、海外華人以及

香港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三)王賡武教授爲近年出版的一些論著所寫的序言或導論。在選編過程中，我根據主題、時間與空間的跨度等原則對這些文章作了進一步的分類和排列；除了更正一些印刷上的錯別字之外，編者對原文的內容並無任何增刪。我認爲，這些資料較集中地展現了王賡武先生作爲教師、學者、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的豐富經歷與卓越成就；它們同時也反映了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文化、政治和人生哲理等問題的深切關注與坦蕩情懷。

筆者十分感謝王賡武教授和潘國駒教授的信任與鼓勵。八方文化企業公司的韓川元先生是本文集的具體策劃者並做了大量的編輯工作；對於他的支持與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2000年7月21日

識於新加坡國立大學

目 錄

編者的話	<i>i</i>
劉 宏	
 訪談 / 特寫	1
生命之樹長青	3
——專訪王賡武教授	
劉 宏	
記王賡武教授	15
黃昆章	
王賡武從《史記》踏上史學研究路	34
——本書決定終生職業	
曉 黎	
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38
——王賡武校長談“南大事件”	
王賡武在澳洲	48
斯蒂芬·菲茨杰拉德(Stephen Fitzgerald)	
澳大利亞的華人和澳中友誼	56
——訪香港大學新任校長王賡武教授	
金明遠	

王賡武天降大任	60
唐德剛	
港大校長王賡武教授談過渡期港大的使命及角色	69
《信報財經月刊》記者	
港大校長論港府大專新政	81
——專訪王賡武校長	
翁愛明	
民主社會才能促進科技研究發展	92
——記王賡武教授在新亞第卅八屆畢業生歡送會致辭	
王賡武與政治有不解緣	99
何澤	
我看香港的環保	102
——香港大學校長王賡武一席談	
黃幸群	
希望維持中國基本秩序不變	109
——王賡武談加深對中國的瞭解	
馮玉蓮	
“我一生都在大學度過，從來沒有政治野心”	116
——訪香港大學前校長王賡武教授	
文灼非	
中國現代化的楷模	124
王鵬翔	

 言論	129
中國和東南亞與華人問題	131
“大中華”與海外華人	146
華商文化的研究	149
華人企業家及其文化策略	158
——在第二屆世界華商大會上講演摘要	
投資中國熱潮遍及全球	167
——東南亞華人僅亦步亦趨	
香港充滿矛盾的現代化過程	173
“孫中山先生與香港的關係”	185
——於孫中山先生獻身革命一百年紀念會上的演講	
對第二號報告書之反應	192
——在香港大學評議會的演講	
香港人的身份意識	200
——崇基學院第卅五屆結業崇拜致辭	
香港雙語社會的語文政策與規劃	205
東西方教育傳統與大學生	211
道德與法律	215
爲善之難	224

序言	233
《林紹良傳》宋哲美著	235
《有志竟成一孫中山倫敦蒙難及影響》黃宇和著	237
《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吳清德著	240
《徐四民言論集》徐四民著	242
《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 李元瑾著	244
《出國華工與清朝官員》顏清煌著	246
《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黃紹倫編	248
《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林孝勝著	251
《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柯木林主編	253
《非政治化的政治：中國國民黨對學生運動的 政策，1927-1949》黃堅立著	255
《煙與火：蒙特利爾的華人》陳國貴著	258
《香港史新編》王賡武主編	260
《海外華人百科全書》潘翎主編	263
《龍牙門新考》林我鈴著	271
《中國—東南亞學：理論建構·互動模式·個案 分析》劉宏著	272

訪談 / 特寫

生命之樹長青

—專訪王賡武教授

劉 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初，應香港《地平綫月刊》之約，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與王賡武教授進行了近兩個小時的專訪。期間，王教授縱論古今中外，回顧了自己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的讀書、治學、及出掌香港大學的經歷與感受；他對海外華人及中國在廿一世紀的前景也做了簡要而透徹的展望。訪談完畢，我不禁想起王教授數年前所寫的一篇題為〈在非華人之中〉的學術論文，載於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所編之《*The Living Tree* (生命之樹)》之中。的確，王教授數十年來在華人與非華人世界中的經歷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就像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樹，從各種肥沃的土壤中汲取養分，並不斷地散發出活力，為週圍的樹木和小草提供茁壯成長的環境。

動蕩的青少年時代：泗水、怡保、南京

劉：王教授，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能否請您談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及其對您青少年時代的影響？

王：家父出生在江蘇泰州，一九二五年畢業於南京的東南大學，此後南來，曾在新加坡、吉隆坡和馬六甲華校任教。在二十五歲那年，他應聘到印尼泗水的第一間華校擔任校長。我就是一九三〇年在泗水出生的。後來，因為經濟大蕭條，學校發生經濟困難，家父就回到馬來亞，擔任霹靂州的副視學官，所以，我是在怡保長大並接受教育的。我唸的是以英文為媒介的安德森學校。

劉：您就讀的是英校，那麼，您是如何產生並培養對中華文化和歷史的興趣？

王：我對中華文化的興趣，是父母親培養的。在我很小的時候，大概三、四歲時，家母就先開始教我認字、背書、和抄寫漢字。此後，家父教我古文，從《三字經》教起。不過，他知道父親教兒子很難教好，所以特地在家裏辦了一個班，讓我和他的朋友們的子女一道學習中文。

劉：那麼，您在少年時期是否回過中國？

王：其實，先父一直很想回國，但那時在泗水中學工薪付不起他回國的旅費，祇能到新加坡。一九三六年他帶我回去。在江蘇泰州，老家人說，中日戰爭這場仗一定會打，你們還是留在外面比較好，這樣也可以在經濟上幫助家裏。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他也想回去，但是那時他想等我唸完中學之後再走。當時我學的英文還不錯，跳班考到劍橋九號班(也就是最高的班)。一九四七年四月，我中學一畢業，家父就辭職，帶我回南京報考中央大學(其前身就是東南大學)。

劉：當時考試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您後來在中央大學唸了多久？

王：我的英文和中文都沒有什麼問題，數學和科學對我的挑戰性比較大，因為我在馬來亞是以英文來學這些科目的。所以需要花較多的時間來準備中文的專有名詞等。我從一九四七年在中央大學外文系就讀，祇唸了一年多，到了淮海戰役之後，南京就很亂了。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學校就關閉了，老師、同學都回家，祇剩下我們幾個學生在學校。大家都感覺到南京肯定會打仗。

劉：所以，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您的全家決定返回馬來亞？

王：家父回國後，就在中央大學附中教書，但是，他不適應南京的氣候，身體一直欠佳。我還記得我有時下課之後還幫他改考卷。這時，怡保的教育界正好想請他回去。於是父母親在一九四八年春回到馬來亞。他們當時非常傷心，知道從此一去就再也沒有機會回到祖國(後來果真如此)。

劉：所以，一九四八年期間，您是一個人留在南京？

王：對。家父每個月寄十五元港幣給我，我每次要用錢時，就拿一元去兌換。當時是內戰時期，物價飛漲，所以我可以說是“百萬富翁”。由於我是獨生子，父母親很擔心我的安全，就勸我回到他們身邊。其實我當時唸書，倒是無所謂。但是，當時學校關了，也沒有書可唸。所以，在一九四八年底，我將所有的書送給圖書館，祇攜帶隨身用品，像難民一樣地擠上開往上海的火車(連火車票都不用買)，然後從上海經基隆、廈門、香港，回到馬來亞。

與新興國家一起成長：馬來亞歲月

劉：從中國回到馬來亞，這可以說是您一生中的一個關鍵轉折點。您是如何重新融入、適應新的環境的？

王：一九四九年初，我在怡保教書，教了幾個月，就考上了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就讀於文學院。在本科三年期間，我選了三門主修科目：英國文學、歷史學和經濟學。後來這三個系都錄取我讀榮譽學位。我的興趣本來在文學，但是我決定選擇歷史學，主要是覺得我的歷史教授很有學問。

劉：您在一九五四年去倫敦大學攻讀博士，一九五七年畢業後就回到馬來亞大學任教。當時的馬來亞正處於一個從殖民地到獨立的變遷過程。這種時代環境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王：這的確是一個風雲突變的年代。一九四八年英國宣佈“緊急狀態”，當時，反帝反殖鬥爭此起彼伏，我也積極參加了馬大學生會的活動。後來我的很多同學都成為馬來西亞社會和政治活動的領導人。通過馬來亞流行的反殖民主義和英國式社會主義視角，我獲取了一種新的民族國家認同。這是從作為僑居者向自覺地決定定居在中國之外的第一步。我最終何去何從依然不得而知，但學做一個馬來亞聯邦的公民是一個開端。儘管如此，認知中國的責任感仍然保留下來，這就是完成我已經開始的工作，理解這個古老文明可能出現的偏差及其依然具有的前途。在僑居和定居之間，我發現作為華人並不是障礙，而是支點。於是，轉向研究中國歷史看來是最自然不過的。

香港大學的日子：激蕩人心的挑戰

劉：我們知道，您一九六八年應聘到澳洲國立大學擔任遠東歷史教授暨系主任，此後還擔任了該校的太平洋研究院院長，直到一九八六年出任港大校長為止。您能告訴我在港大期間感受最深刻的事情嗎？

王：我上任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署。我認為，如何能夠使港大在回歸之後，一方面能適應新的、後殖民地時代的環境，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與中國內地的高校不同的學術傳統，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當時特別重視兩點：第一，學校辦得好，中國方面一定會欣賞；主要是水平要高，學生畢業後能對社會做貢獻；第二，我特別強調的是，香港的作用，對中國來講，是能夠在國際上從各方面幫助中國。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香港的作用就更重要。在這方面，我認為香港應該維持雙語政策。

劉：在即將回歸大陸的香港，這種政策是否造成一些爭議？

王：當時很多人主張多用中文，少用英文，說這是殖民地語言。其實，從香港的地位和作用來講，這不是一個好的政策。爲了港大、港大的學生，也爲了香港對未來中國的作用，我很注意雙語政策的重要性。這點在政治上可能有人誤解。我也同學生、家長、和社會人士討論這一問題。他們基本上支持我的看法。我不反對母語教育，但是，如果把港大變成中文的大學，與中國內地的大學有什麼不同？怎麼能夠幫助中國？我對學生說，回歸之後，你們的中文不可能比內地學生好，如果能達到差不多的水平就很不錯了。但

是，如果你的英文也好的話，至少你有些事情可以做。因此，我鼓勵他們學好英文。我知道，這是很有爭議的，但是，我堅持這個政策。

劉：從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水準上看，您是如何替港大在亞太區域以至國際的高等學校中定位的？

王：其實，港大水準本來已經不錯，基礎已經打得很好，特別是醫學院和理學院；他們的研究在國際上都能站得住腳，工學院和法學院也不錯。人文與社會科學就比較複雜些。不過，我上任時，港大最大的弱點是研究經費不足。政府和工商界都不鼓勵，認為要做研究就到外國去做，我覺得如果研究經費不足的話，大學無論如何辦不好。所以，向政府積極爭取。好在我的前任黃麗松校長就已經開始這項工作，我到了之後繼續爭取。

劉：那麼，成效如何？

王：到了一九八八年，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否則人才流失會加劇。港大最好的學生在國外唸博士後大都不回來，主要原因不是薪水或政治環境，而是缺乏研究經費。我拿出統計數據給政府看，說大多數的高材生都不回來，你要港大怎麼樣辦下去？完全靠外國學者也不是辦法。所以，政府也同意了。此後研究經費就很充足，請人也没什么困難了。

劉：除了經費之外，您覺得在這九年半的任期內，港大還發生了哪些較大的變化？

王：最大的變化是研究方面。我剛上任時，真正做研究的教師不多，而且非常辛苦。到我卸任時，大概有80%的教師都在做研